

物的归来：社会工作的 “道德—物质”实践探究

卫小将 王志豪

摘要 社会工作是以“人”为中心的专业，这导致“物”长期处于其理论边缘，内含的助人功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挖掘。为此，有必要将物带回社会工作研究的中心，通过阐释物在专业服务中的角色与价值，构建一种兼具伦理关怀和物质敏感性的实践模式。具体可以从三方面推进：一是厘清物质转向思潮对社会工作理论的启示，强调物不仅是工具性资源，还是能动的社会行动者；二是借助拟客体的概念，将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物分为自然物、工具物、关系物和象征物等，并呈现各自在专业服务中的功能；三是反思社会工作理论“见人不见物”的根由，提出社会工作应超越单一的“人—人”道德实践，迈向更具伦理包容性的“人—物—场景”的“道德—物质”实践。这不仅可以拓展社会工作的理论边界，也可以为实务工作者提供更具整合性的干预思路。

关键词 物 社会工作 “道德—物质”实践

作者卫小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王志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11-0121-12

一、引言

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物”的角色似乎经历了一个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变。^① 在早期的慈善救助工作中，物质匮乏是受助者的显性需求，例如食物、衣物、住所等资源直接关乎其生存福祉。尤其是在 17 世纪西方的“济贫运动”中，社会工作的重点是满足服务对象的生理性需求，并试图用宗教劝导等手段治疗情感性问题及应对个人困难。^②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物质匮乏得到了缓解，社会工作的关注点也逐步转向了“心理疗愈”“行为改善”和“关系建构”等非物质层面。^③ 物不再被视为社会工作的核心，而是沦为专业服务中看不见的附属品。与此同时，有关物的讨论也很少出现在社会工作理论中。

^① 按照《说文》的解释，“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因而，“物”的本义是指杂色牛，进而引申指毛色、杂色。因杂色含有众多的意思，故引申为万事万物。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物”主要包含三种含义。第一指人以外的具体的东西，如事物、生物；二指内容、实质，如言之有物；三指自己以外的人或跟自己相对的环境，如待人接物。本文的“物”概念主要取第一重意思，即泛指各种具体的东西，但认为这些东西由各种“物质”构成，并具备区别于意识、文化等概念的核心特质，即“物质性”。因而，本文在谈论具体的事物时会强调“物品”的概念，而当分析“物品”背后的构成性条件和核心特质时会使用“物质”及“物质性”的概念。

^② 查尔斯·H. 扎斯特罗等：《社会工作实务：应用与提高》，晏凤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③ Harry Specht and Mark E. Courtney, *Unfaithful angels: 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Roberta R. Greene, *Human behavior theory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 Routledge, 2008; Fabio Folgheraiter, *Relational social work: Toward networking and societal practices*,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2003.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转向，虽极大地深化了社会工作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理解与关怀，却也无意中造成一个长期“见人不见物”的理论盲区，使得我们无法充分把握服务对象生活的复杂性与整体性。例如，在处理亲子冲突时，社会工作者往往聚焦于亲子沟通技巧的训练及其关系调适，却可能忽略了服务对象所处的物质环境。孩子没有独立空间做作业，父亲下班后也无处放松，持续的隐私缺失不断诱发家庭成员的负面情绪。这种物质空间的紧张感持续地生产着人际关系的摩擦，使得任何脱离环境改造的纯粹关系调适都难以持久和有效。因此，当社会工作的干预措施悬浮于物质现实之上时，其服务的成效便会大打折扣，无法真正触及服务对象的生活根基。事实上，物一直是社会工作服务场景中的客观存在，如西方社会工作的先驱玛丽·埃伦·里士满（Mary E. Richmond）就特别重视物在专业服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她将物视为服务评估的间接证据并提出“案主的家庭环境就是他生活条件的真实证据，餐桌上的食物就可以真实地表明案主家中是否有充足的食物，等等”。^①此外，里士满还将物作为专业帮扶的工具，她认为“只要案主家中一些熟悉的物品使他感受到积极生活的一面，这种服务效果就会很大”。^②尽管如此，物在社会工作服务中仍未受到足够关注，更缺乏系统的理论提炼，其充其量被当作满足服务对象生理需求的辅助工具。^③换言之，虽然社会工作常常强调为服务对象链接“资源”，但这种资源物更多是在工具性逻辑下被理解的，它被视为一种等待工作者去挖掘、链接和分配的被动物质。而本文强调的“物”不仅是社会工作者达成目的的工具，更是深度融入并共同构成服务对象生活世界的积极参与者。如一个轮椅，它不仅是出行的“资源”，更是残障者身体的延伸以及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深刻影响其社交互动的方式。因此，本文所言物的缺失，并非指社会工作不提供物质援助，而是指在理论认知层面，学界长期未能充分识别和阐释物所承载的能动力量、情感象征和社会意义。

那么，究竟“物”为何意呢？学界的界定比较复杂。英文世界有诸如“material”“thing”“object”“stuff”“matter”“artifact”等提法，而中文世界则有“物”“东西”“玩意儿”等表述。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既相互叠加，又不全然一致。^④为避免陷入无谓的概念辨析与争论，本文侧重于讨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具体物，既包括食物、衣物、植物、房屋等可感知物，也包括网络软件、虚拟礼物、线上课程包等虚拟物。^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物主要从社会工作实践的视角理解和阐释。当然，随着全球技术变革的日益深化，物的内涵也逐渐突破了工具化的定势。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物深度参与到人们的社会交往、情感连接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如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平台等既为服务对象提供便利，也重新塑造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伦理等议题的兴起，也促使我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⑥面对这些变化，作为一种充满社会关怀并致力于提升社会福祉的专业，社会工作有责任将伦理关怀扩展至非人类世界，关注物的“福祉”及与人类福祉的关联。^⑦因此，重新思考物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价值和功能，不仅是其理论拓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服务效能提升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兴起了物质转向的新趋势，学者们重新审视物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挑战长期“重人轻物”的定势思维。许多研究也开始强调物的能动性和活力，认为物并非是被动的客体，其本身就具有行动力和影响力，物与人类共同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通过彼此关联和互动产生社会效应。^⑧这些研究结

①② 玛丽·埃伦·里士满：《社会诊断》，刘振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5、149页。

③ Helen Scholar, “The neglected paraphernalia of practice? Objects and artefacts in social work identity, practice and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16(5), 2017, pp. 631–648.

④ 戴宇辰：《“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理解城市传播分析的物质性维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3期；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

⑤ 本文所探讨的虚拟物，主要聚焦于网络空间中以多种数字图像形式呈现出来的虚拟本体，具体包含两种类型：一种是线下物理世界的实物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如虚拟商品、虚拟礼物，强调网络化的“真实”再现；一种是由网络空间本身生成的虚拟实体，如虚拟数字人、微信小程序等，强调技术化的应用表达。参见马梦娇、符绍强：《技术与艺术的合谋：基于“物恋”谱系下的虚拟物》，《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24年第3期。

⑥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⑦ Mel Gray and John Coates, “Environmental ethics for social work: Social work’s responsibility to the non-human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1(3), 2012, pp. 239–247.

⑧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论为我们理解物的社会性提供了重要参考工具。但在社会工作领域，尽管也有学者开始注意到物的相关议题。^①但整体来看，仍然缺乏对物的价值进行系统性思考，大多数研究只关注特定物在实务中发挥的功能，如，考察社会工作历史档案或遗产材料的保护与发展^②，分析汽车在儿童和家庭社会工作中的应用等^③。这些研究对物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将物简化为冷冰冰的物质存在，忽略了其承载的情感象征和社会意义。如，礼物作为物的一种具体表现，早被证实在维系社会关系、传递情感和构建信任方面具有独特潜力^④，却很少被纳入社会工作实践视野中。

综上，重新将物带回到社会工作的研究中心，审视其在专业服务中的价值，对推动社会工作理论拓展和实务模式创新均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具体从三方面推进研究：一是探寻社会科学的物质转向对社会工作理论拓展的启示；二是呈现社会工作实践中物的具体类型及其功能；三是探索社会工作实践的物质敏感性，从“以人为中心”的道德实践迈向更具包容和反思性的“道德—物质”实践。

二、“物质转向”思潮对社会工作的启示

物质转向为社会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旨在研究物质如何塑造人类经验和社会结构，有力地挑战了将物视为被动背景或思想附庸的传统观点。这一思潮的核心在于，承认物本身具有能动性，能够影响甚至塑造社会和文化。^⑤当然，物质转向并非注重惰性的物本身，而是强调世界的动态、流动和生成性，并认为事物不是静态实体，而是不断变化的过程。^⑥穆克吉（Mukerji）曾总结过物质转向背后的理论驱动力，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文化研究、福柯思想以及科学技术研究（STS）等。^⑦这些理论都在有意无意地强调物质要素在社会、文化、历史和知识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在这种宏观的背景下，具体涌现出三大关键性的理论流派：后人类主义、新唯物主义与行动者网络理论。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些理论流派在核心思想上存在相似之处，并且相互之间有所影响，但它们各自关注的理论焦点和现实问题还是有所不同。这些差异最终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的分析框架：后人类主义率先从哲学层面上打破了“人类中心”的藩篱，为人们关注非人类世界开启了理论空间；新唯物主义则深入到本体论层面，赋予物本身以活力和能动性；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则提供了一套方法论，用于分析人与物如何共同编织成动态的社会网络。它们共同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拓展提供了启发。

（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物质转向”思潮概述

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兴起了一股物质转向的思潮。这一转向部分源于对过度“语言学转向”的反思，试图重新平衡符号话语与物质现实之间的关系，强调技术、环境、身体、物品等物质要素如何积极参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作为物质转向思潮的理论先声，后人类主义的贡献主要在于系统性地反思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更加关注人们置身的技术社会背景——人体医学革命、基因生物技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赛博空间等现代技术图景，着眼于人与物质技术之间的关系变化与未来发

^① Helen Scholar, “The neglected paraphernalia of practice? Objects and artefacts in social work identity, practice and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al Work*, 16(5), 2017, pp. 631–648; Matilde Høybye-Mortensen, “Social work and artefacts: social workers’ use of objects in client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8(5), 2015, pp. 703–717; Adrienne Chambon, Marjorie Johnstone and Julia Winckler, “The material presence of early social work: The practice of the archiv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1(4), 2011, pp. 625–644; 李珊珊、何雪松：《面向不确定性：社会工作理论的新挑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② Ellen Daly and Neil Ballantyne, “Retelling the past using new technologies: A case study into the digitization of social work heritage material and the creation of a virtual exhibitio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 human services*, 27(1), 2009, pp. 44–56.

^③ Harry Ferguson, “Therapeutic journeys: The car as a vehicle for working with children and families and theorising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24(2), 2010, pp. 121–138.

^④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⑤⑦} Chandra Mukerji, “The Material Turn,” in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Robert A. Scott, Steven M. Kosslyn and Marlis Buchmann (eds.), Wiley, 2015.

^⑥ Luigi Pellizzoni, “Catching up with thing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the material turn in social theory,”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2(4), 2016, pp. 312–321.

展。^① 在后人类主义的视域中，人类与非人类的物体之间并无本质性的不同或界限，人类与物的距离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般遥远。^② 这为社会工作理论拓展开启了新的空间，正如薇薇安·博扎莱克（Vivienne Bozalek）与鲍勃·皮斯（Bob Pease）所指出的，后人类主义质疑了社会工作中习以为常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假设，挑战了人类的特权和例外主义。^③ 不仅如此，后人类主义还主张将伦理关怀扩展至人类之外，关注所有的生命形式以及更广阔的生态系统。

如果说后人类主义打开了关注非人类世界的大门，那么新唯物主义则邀请我们深入探索门背后的物的世界。它认为，传统欧美哲学忽视了物的内在意义，将其贬低为需要人类赋予意义的惰性基质。事实上，物并非被动存在，而是具有动态能动性。^④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托弗·甘布尔（Christopher Gamble）认为，新唯物主义包含三种不同取向：活力性新唯物主义（vital new materialism）、否定性新唯物主义（negative new materialism）和表现性新唯物主义（performative new materialism）。^⑤ 活力性新唯物主义将物视为一种自我创造和不可预测的力量，它虽然强调了物的生命和活力，但忽略了物的死亡与无机性。否定性新唯物主义主张物与思想之间存在非关系性分离，认为物具有绝对偶然性，能超越人类感知。相较于前两类，甘布尔等更推崇表现性新唯物主义，认为该取向将物视为行动或运动的表现，物的意义和能动性不是预先存在，而是通过相互作用生成。因此，这种取向避免了活力主义的扁平化和否定主义的非关系性弊端，强调了物的丰富性和关系性。如果说后人类主义启发社会工作要将关怀视野投向更广阔的非人类世界，那么，新唯物主义则格外强调社会工作者应重视各类物品（如住房、收入、地理位置等）对服务对象生活的整体性影响，继而发展出更加整合式的服务策略。

承认了“人—物”共生和物的能动性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分析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呢？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此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行动者网络理论同样强调物的能动性，但更将社会和自然世界视为由人类及非人类行动者构成的动态网络，强调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虽然这些观点与新唯物主义有许多重叠，但人们一般不将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及其思想视为“新唯物主义”派别。除了其本人对这一标签保持着刻意距离以外，还在于拉图尔从未对物的能动性本身进行充分的讨论。^⑥ 也或许是他本就无意深度思索物本身，其始终看重的还是行动者网络的生成与连接。因为拉图尔认为，由人或非人等行动者所组成的网络是动态生成的，通过连接和断开连接来构建与解构，因此不存在所谓的微观和宏观区分，一切层次结构都可以理解为连接关系。^⑦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行动者网络理论消解了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与物之间的割裂认知，将服务对象和物一同视为嵌入动态关系网络中的行动节点，强调社会工作干预实质上是网络重组的技术与艺术。

（二）“物质转向”思潮对社会工作的启示

社会科学领域有关物质转向的研究为重新思考社会工作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上述理论强调社会工作的伦理关怀要从狭隘的服务对象，拓展至非人类物及其与人的关联上，强调物本身对服务对象所产生的持续和整体的影响，并关注这种影响如何以网络式的动态方式而生成。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也要从“问题解决者”向“网络协作者”的角色转型，努力实现一种对物质要素更为敏感的关系性实践。通过梳理上述理论及其对社会工作的影响，有助于探索一种更具整合性的分析视角，进而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物在专业服务中的价值。

首先，后人类主义“人—物”交融的设想至少从两方面推动社会工作服务的进一步深化。一方面，面对

① 林秀琴：《后人类主义、主体性重构与技术政治——人与技术关系的再叙事》，《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②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③ Vivienne Bozalek and Bob Pease, *Post-Anthropocentric Social Work: Critical Posthuman and New Materialist Perspectives*, Routledge, 2022.

④ 物的能动性（material agency）是物质转向思潮中的核心概念。它挑战了传统人文主义中只有人类才具有能动性的观念，认为物并非人类活动的背景，而是积极参与构成现实的力量。这当然不是说石头会“思考”或机器有“意识”，而是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产生作用的网络之中。比如，人和手机形成了一个人与技术的组合体，这个组合体的行为能力是人体单独或手机单独都无法实现的。手机的设计、算法、界面等都在参与塑造人们的行为模式。因此，在社会工作中强调物的能动性，意味着从专业人员面向服务对象的线性服务模式，转向关注人与物之间复杂网络的系统性实践模式。

⑤ Christopher Gamble, Joshua Hanan and Thomas Nail, “What is new materialism?” *Angelaki*, 24(6), 2019, pp. 111–134.

⑥ 郑作或：《物—人关系的基本范畴：新唯物主义社会学综论》，《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2期。

⑦ Bruno Latour,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few clarifications,” *Soziale Welt*, 47(4), 1996, pp. 369–381.

严重依赖轮椅、假肢、助听器或植入物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应格外重视这些物对其生活产生的影响，认识这些物的生命意义。这些物不仅是他们的辅助工具，也是其身体和身份的一部分，更是其情感表达和社会关系建立的重要载体，深度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参与和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数字科技物的介入创造了新的社会工作服务形态。在虚拟世界中，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内，而是以数字身份存在于赛博空间。当然，尽管这为社会工作的远距离服务以及问题监管提供了可能，但也带来隐私泄露、数字鸿沟、专业边界的模糊以及服务模式适应性的不足等风险。^①因此，后人类主义也要求社会工作重新审视传统面对面的干预模式，正视虚拟物对专业服务带来的挑战，探索数字化环境下的服务边界并处理相关的伦理问题。

其次，新唯物主义启发社会工作从物质能动性的角度去评估服务对象的状态和需求。在传统社会工作服务中，各类物（如收入、住房、食物、家具）往往被视为一种静态的辅助支持工具，而新唯物主义警醒我们，物本身就具有塑造服务对象生活体验的能力。如对于遭受创伤的儿童，柔软的玩具已经超越了娱乐工具本身，而是能给其带来安全感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而言，一件具有怀旧意义的衣物或照片可能唤起他们的深层情感记忆，并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情感动力；对丧亲者而言，亲人使用过的某件遗物能够成为其寄托哀思和缓解创伤的“良药”。因此，新唯物主义强调社会工作者应发展出一种对物质环境更加敏感的实践能力，从而将物的供给、情感支持和能力建设有机整合起来，探索一种更为整体性的干预策略。

最后，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社会工作提供了理解人与物之间复杂关系的新视角。它启发社会工作者将服务对象视为嵌入在由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构成的网络中，而非去孤立看待服务对象和物。如在社区工作中，社区活动中心的桌椅布置、交通工具的便利性、公共空间的布局等物质性要素都会影响社区成员的互动模式和凝聚力。再如在农村社会工作中，农业、农村和农民是相互交织的“物质网络”共同体，割裂任何一方都难以评估农民的需求并理解其行为背后的意义，其具体的干预也需要在三者互动中推进。由此，在人与物的混合网络中，物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塑造服务对象网络结构和功能的积极参与者。对社会工作而言，有效的社会干预不仅需要关注人际关系和制度支持，还需要关注物质网络的重组，将人和物视为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整体。

（三）社会工作“人—物—场景”实践框架

上述三个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提供了新的维度。一般而言，人在情境中强调情境对个体的影响，但对情境的理解主要侧重于社会关系、文化因素和制度结构，对物的关注不足。童敏通过回顾西方社会工作的历史发现，人们对情境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站在局外人立场把情境当作客观现实，注重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二是站在局内人角度把情境视为经验现实，通过反思寻找个人经验中的现实。这两种观点虽有不同，但都倾向于将问题对象化和客观化。^②与此不同，中国社会工作应将问题“场景化”，强调服务对象的改变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情境动力。为此，他发展了“情境”的概念，认为人是变动的，而且环境也是变动的，因此要根据双向变动的要求建立“人—场景”的生活实践框架。^③这种从“情境”到“场景”的概念延伸也说明，中国的社会工作者是在社区现实生活场景开展服务，并以解决居民实际问题为工作中心的。尽管“场景”是本土性的概念，但对于物的重视还显不足，毕竟物作为实际场景中具体且关键的要素之一，能够为我们理解和干预服务对象的处境提供新路径。基于此，通过借鉴物质转向对社会工作的理论思考，本文尝试构建一种更为动态和整合性的“人—物—场景”分析框架，具体阐释如下。

其一，从认知角度看，“人—物—场景”框架强调场景不只是服务对象所处的抽象背景，而是由具体的物和服务对象构成的复杂网络。如对于社区老年公寓的独居老人来说，传统社会工作服务可能强调通过家访关注其心理状态和社会支持。但从“人—物—场景”角度看，老人房间中的每一件物，都是参与其生活的重要“生产者”：墙上的照片不仅呈现了其与家人及朋友的亲密关系，还揭示了他的生命叙事、情感来源和精神寄托；茶具的摆放方式也可能反映出他渴望社交的意愿，甚至是一种邀请访客的非言语符号；门口防滑垫

^① 胡莹：《数字社会工作的概念、发展与青年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伦理挑战》，《当代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

^② 童敏：《情境动力：中国式的“助人自助”专业实践逻辑》，《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2期。

^③ 童敏：《生活实践：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考察》，《社会工作》2024年第1期。

的存在，则可能意味着他对安全的关注和生活秩序的在意，也可能反映着服务人员周到细致的安排等。这些物不仅是环境的一部分，更是构筑老人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们与老人共同制造出特定的生活场景。因此，真正的“生活实践”要求社会工作者应细心留意这些物的摆放、使用以及保存状态，以便更深入地理解老人的心理需求、社交模式和生活习惯，进而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其二，从服务角度看，在“人—物—场景”框架中，社会工作注重“人—物”互动的微观过程，关注服务对象如何使用、改造和赋予物以意义，反过来物又如何塑造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经验。传统的社会工作服务往往只关注服务对象的物质需求、社会关系和情感表达，对其与物的互动互构过程重视不足。而物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微观互动往往会影响服务对象的行为模式及其情感投射。例如，有创伤经历的儿童可能会依赖特定的物来感知安全和舒适，这个物可能是一个毛绒玩具、一件印有卡通人物的T恤，或自己设计的一只小箱子等。为此，社会工作者应积极捕捉这些物在儿童生活中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它们不仅是物理性的存在，更是孩子们情感世界的载体。不仅如此，这些物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帮助孩子们建立起安全感和自信心，让其在情感上获得一定的支配感和稳定性。因此，在儿童社会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应积极引导儿童与物建立起健康的情感联系，借助物来促进孩子的情感修复和认知发展。

其三，“人—物—场景”框架强调发展一种对物的要素更为敏感的社会工作实践，注重将物的供给与心理赋能、关系构建等传统服务有机整合，形成一种整体性的干预策略。以社会救助为例，社会工作者除了给救助对象提供必需的食物和临时住所之外，还可以考虑通过物的供给来推动其心理复原和社会融入。如为服务对象提供带有其名字的物品包（包括毛巾、洗漱用品、温暖的衣物等），这些物中的符号传递出对他们的重视和尊重，并让其感到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和价值，进而体会到一种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温暖。当然，这种物质敏感的实践不是简单地增加物的供给，而是策略性地利用物所承载的社会意义和情感价值，创造更加整体又多维的服务体系，使社会工作能同时作用于物质、心理和社会等多重层面，真正实现“人—物—场景”的整合性干预。

总之，物质转向思潮拓展了社会工作的既有理论视野，为构建更具整合性的“人—物—场景”干预框架提供了思想来源。它促使社会工作者深刻意识到，不应将“物”看作是一种被动的资源，而应将其视为是与人共同塑造生活场景的积极伙伴。

三、社会工作实践中物的类型及呈现

从学理上讲，物对服务对象的成长和改变具有重要价值，但它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形式和类型还需进一步探索。在此，我们借助拉图尔的拟客体（quasi-object）概念进行分类阐释。拉图尔认为，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孤立的主体或客体，只有一种拟客体，且“拟客体位于两极之间、之下……与自然的‘硬’的部分相比，拟客体要更加社会性、更加具有被构造性和集体性，但它们绝不是一个成熟社会的信手拈来的容器。此外，与社会投射（这种投射毫无理由）之上的那些无定形屏幕相比，它们又更加实在、更加非人类、更加客观”。^① 换言之，拟客体是自然与社会的杂糅体，既有主体的“软”也有客体的“硬”，不仅如此，它“时而像是一个物，时而像是一段表述，时而又成为一种社会纽带，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无法被还原为某个纯粹的存在者”。^② 在此基础上，拟客体涵盖了现代社会的四种储备资源：自然（实在）、社会、表意（语言）和存在。^③ 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中对此进行过阐释：第一种资源与自然实在相关，主要是外在于人类的存在。第二种资源主要指社会纽带，它将人类彼此联结起来。第三种资源讨论的是意义，是支配人们象征性意义的文本和话语，涉及叙事与修辞。第四种资源谈论的是存在，这种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人们产生社会关联的物概括而言。^④ 由此，拟客体也就有着自然性、关系性、象征性与工具性等特点。对于身处现实场景且与人紧密互动的社会工作，物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人—物”关联的拟客体属

^{①②④}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14、182、181—184页。

^③ 汪民安：《物的转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

性，因此，我们也将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物划分为四类，即自然物、工具物、关系物和象征物。当然，为避免对这四类物的解释流于空泛，下面将结合社会工作的实践情境进一步展开讨论，着重从功能性的角度审视这些物，即从物所能发挥的自然疗愈、工具赋能、关系联结和文化象征等潜在价值进行分析，从而为物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应用提供启发。

（一）自然物：自然疗愈与生态赋能

自然物主要指来源于自然界，未经过人工改造的天然物品，如阳光、空气、水、土壤和植物等。在社会工作实践中，这些物往往以原初形态参与专业服务，在特定情境中发挥独特的治疗或支持功能。如社会工作者利用自然环境建构治疗性场所，通过让服务对象贴近自然物来促进其身心健康。园艺治疗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干预方法，它将植物作为治疗媒介以实现特定的治疗目标。既有研究证明，园艺治疗能够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包括减轻抑郁、焦虑和压抑症状，提高自尊和社交能力等。^① 此外，园艺治疗还强调在与植物互动的过程中激发个人潜能，从而有效发挥身心功能恢复、家庭关系维系、社会功能发展以及共建美好社区等功能。^②

自然物不仅能够在社会工作微观干预中发挥作用，还可以在宏观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产生积极影响。长期以来，物理空间和自然环境都很少被社会工作所关注，直至全球生态危机以及风险分配不平等才使得环境问题进入社会工作视野。为此，莉娜·多米内利（Lena Dominelli）提出了绿色社会工作视角，旨在保护环境和提升人类福祉。^③ 古学斌等人则用实际行动活化了自然物的策略性价值，践行了绿色社会工作的宗旨。^④ 2001年，他们在云南一个少数民族村寨先后开展了生态种植保护、城乡资源联动、公平贸易等活动，不仅切实提高了村民的收入，而且促进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这一实践案例较好地诠释了自然物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积极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到，通过跨专业协作和精细化的社区评估，社会工作者不再将物视为单一的救助手段，而是将其转化为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物也不再是被动和静态的资源，而是成为主动且充满潜能的社会变革工具。

（二）工具物：现实辅助与数字干预

工具物主要被设计用来完成特定任务，它在社会工作服务中充当辅助性的媒介，其形式既可以是专业化的服务工具，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如在个案工作中，社会工作者使用的评估量表、个案记录表和访谈提纲等都属于典型的工具物，它们可以帮助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状况进行系统化的记录、收集和评估。在小组工作中，绘画材料、手工工具和游戏道具等也是促进参与者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孙旺辉等曾尝试将绘本和游戏用于减缓白血病患儿的医疗恐惧情绪，他们通过《我的情绪小怪兽》《我不怕疼》等故事绘本，帮助患儿识别并表达恐惧和悲伤等情绪，纠正其非理性的认知。^⑤ 此外，一些虚拟物作为干预工具也逐步被应用到社会工作服务中，何龙韬等人设计了安宁疗护线上服务微信小程序——“守护带路”，该程序整合了12个核心模块，包括心理支持、法律咨询、经济援助等，并且提供一站式资源链接，满足患者及家属的多元化需求。^⑥ 这些功能具有便捷、智能和整合性特点，不仅降低了患者及家属的心理负担，优化了服务效率，而且提升了他们临终阶段的生活质量。工具物的最新发展，集中体现在人工智能（AI）的应用上。诸如智能陪伴机器人、AI心理咨询应用等高阶智能体，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着我们对工具物的传统认知。这些AI工具物的核心特征在于拟人化能力，即它们不仅能完成信息查询、健康监测等基础辅助任务，更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实现类人的情感识别、共情表达和个性化响应。这些应用已初步融入到儿童福利、心

^① Joseph Cipriani, Ashley Benz, Alanna Holmgren, Dana Kinter, Joseph McGarry and Gabrielle Rufino,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on persons with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Mental Health*, 33(1), 2017, pp. 47–69; Joe Sempik, Cathy Rickhuss and Alex Beeston, “The effects of social and therapeutic horticulture on aspects of social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77(6), 2014, pp. 313–319.

^② 刘斌志、王李源：《园艺疗法：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社会工作新探索》，《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年第6期。

^③ 莉娜·多米内利：《绿色社会工作：从环境危机到环境正义》，王景迁、齐文华、吴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④ 古学斌、Lena Dominelli：《环境危机背景下绿色社会工作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社会工作与管理》2020年第3期。

^⑤ 孙旺辉、罗明军：《“阅读+游戏”疗法减缓患儿医疗恐惧的干预研究——以白血病患儿为例》，《社会工作与管理》2024年第4期。

^⑥ 何龙韬：《AI+安宁疗护社会工作线上服务的干预设计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理健康、药物滥用治疗等关键服务领域，显著提升了社会工作的案例管理效率、预测分析能力及资源分配效益。^①因此，人工智能为社会工作学习和实践提供了崭新的工具与资源，成为社会工作者应对紧迫社会问题、履行专业使命的重要支持。^②相应地，人工智能素养也逐渐成为社会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③不仅如此，这一发展趋势还显现出相当大的专业潜能。从可及性层面来看，AI 工具物能够 24 小时在线提供服务，突破了传统社会工作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能够为处于危机状态的服务对象提供即时的支持；在个性化服务层面，AI 工具物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方法，为每个服务对象提供定制化的干预方案，实现精准化服务；在情感陪伴层面，拟人化的 AI 工具物能够通过模拟人类的情感表达和交互模式，为孤独、抑郁等情感困扰的服务对象提供持续的心理支持。虽然人工智能的进展可能会为社会工作的实践应用带来诸多新的突破，但人工智能也引发了人们对人际疏离、隐私侵犯、算法偏见以及技术应用的社会不平等等问题的担忧。^④尽管机遇与风险并存，但社会工作对 AI 工具物的使用未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总之，实体物通过互动性和趣味性直接缓解了患者情绪并提升了认知能力，而数字化物则通过智能整合和即时支持，优化了工作者资源获取的方式和心理干预的效果。两者均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中心，通过不同形式实现了情绪舒缓、行为引导和资源支持等功能，最终达至改善服务对象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的目的。然而，工具物的应用也需审慎。实体工具可能因成本或使用门槛而产生排斥，而数字工具则可能加剧数字鸿沟，使得不擅长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或低收入群体被边缘化。因此，社会工作者在使用工具物时，须具备批判性视角，评估其适用性与潜在风险，确保工具真正服务于人，而非制造新的不平等。

（三）关系物：情感联结与沟通桥梁

关系物是在社会互动中承载并维系人际关系的载体，它能够促进、调节并反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关系物也是连接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以及服务对象彼此之间的重要纽带。它不是被动的载体，而是主动参与关系建构。例如，当家庭成员围坐一起翻看老照片时，照片本身就塑造着对话的内容、情感的流动以及关系的重新确认。弗洛伦斯·卡斯洛（Florence Kaslow）和杰克·弗里德曼（Jack Friedman）就曾研究过家庭照片和家庭电影在加强家庭成员情感连接中的作用。他们发现，通过共同观看和讨论照片和电影，家庭成员可以分享彼此的感受和经历，继而唤起对过去事件、人物和情感的记忆，最终有助于家人之间增进理解、化解冲突、促进沟通。^⑤而且，这些视觉性物品往往超越了单纯的工具功能，成为连接几代人的“时光机”，是家庭历史和价值观传承的重要媒介。雷江（Lei Jiang）等人的研究也发现，通过分享老照片背后的故事，老年人可以向年轻人传递知识、经验和价值观，增强代际之间的理解和认同。^⑥从而使承载历史记忆的照片激发起两代人之间的情感共鸣，让他们在共同回忆中建立并巩固亲密关系。

不仅如此，关系物在社区层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绘制的社区资产地图，不仅整合了社区中的有形和无形资源，而且活化了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地图中资产之间的连接互动，社区成员可以可视化彼此之间的联系，从而强化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⑦由此可见，关系物的在场不仅直接参与了人际互动过程，而且动态塑造着关系网络的建构与发展，它们既是情感的载体和记忆的容器，更是沟通的桥梁和理解的钥匙。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关系物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分享、在线家庭

① Mackline Nuwasiiama, Metogbe P. Ahoron and Caleb Kadiri,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World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and Reviews*, 24(1), 2024, pp. 80–97.

② Jonathan B. Singer, Johanna C. Báez and Juan A. Ríos, "AI Creates the Message: Integrating AI Language Learning Models into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59(2), 2023, pp. 294–302.

③ Eunhye Ahn, Moon Choi, Patrick Fowler and In H. So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literacy for social work: Implications for core competencie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Social Work and Research*, 16(1), 2025, pp. 9–26.

④ 赵芳、刘思彤：《数字化时代社会工作伦理的挑战与应对》，《社会工作》2024 年第 6 期。

⑤ Florence W. Kaslow and Jack Friedman, "Utilization of family photos and movies in family therapy,"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3 (1), 1977, pp. 19–25.

⑥ Lei Jiang, Panote Siriaraya, Dongeun Choi and Noriaki Kuwahara, "A library of old photos supporting conversation of two generations serving reminiscence therap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2021, 704236.

⑦ Elizabeth Lightfoot, Jennifer S. McCleary and Terry Lum, "Asset mapping as a research tool for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Research*, 38(1), 2014, pp. 59–64.

相册、虚拟纪念空间等数字化关系物正在重新定义着人际关系的维系方式。这些数字化关系物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和跨地域性特点，为现代社会的关系维护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在运用关系物时，社会工作者需要格外注意隐私保护的伦理问题，因为关系物往往承载着深层的个人信息和情感，需要妥善保护和谨慎使用。而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关系物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和禁忌，因此，在提升自身对关系物的敏感度的同时，也需要注重文化适用性。概括而言，关系物的独特价值在于能够超越言语的局限，通过具体可感的物质形态来承载和传递复杂的情感信息，在无声中编织起人与人之间的深层连接。对社会工作者而言，认识并善用这些关系物，可以更有效地推进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连接，增强其社会支持网络并实现干预目标。

（四）象征物：文化传承和意义转化

物不仅承载着关系，更蕴含文化象征意义，不同物的符号性代表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专业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只有理解了物背后的象征意义，才能深入服务对象的文化脉络和社会情境中对其行为进行阐释及干预。如“5·12汶川地震”后的“映秀母亲”项目就是象征物在专业服务中的探索应用。面对遭遇丧恸的妈妈们，社会工作者利用她们擅长羌绣和藏绣的特长培育出妇女刺绣小组，鼓励她们在刺绣图案设计中带入对孩子的思念和愿景，积极讲述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正如古学斌所说“她们既可以常常有机会聚在一起做刺绣、谈心里话、彼此支持，又能在做刺绣的过程中转移注意力，让她们将心思放在刺绣上面，不要每天都想那些悲惨的事情，又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说说笑笑，互相安慰，互相支持”。^①同时，社会工作者又通过组织拍卖会将带有“生命故事”的刺绣作品呈现给社会大众，使她们既获得了物质支持也收获了情感助力，其内在的创伤和压抑得到了有效的缓解。由此，通过将传统刺绣和妇女情感世界有机衔接，从而实现了从个人技能到集体资产、从文化符号到经济资本、从灾难记忆到希望象征的多维转化。在此我们也认识到，作为象征物的刺绣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动被赋予新的内涵，这也使得它具有了意义治疗的功能。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对服务对象生活世界中物的象征系统保持敏感，理解物如何在不同情境中承载流动的意义，进而开展具有文化回应性的社会工作实践。

上述四类物反映出社会工作实践中人与物的复杂关系。虽然社会工作者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将各种物应用到专业服务中去，但物的呈现形式和功能却一直缺少学理阐述。总括而言，自然物通过生态疗愈及绿色实践，将自然界的生命力转化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量；工具物则以实体与虚拟的双重形态，搭建起精准化服务的技术阶梯；关系物在代际对话和社区活动中构建起社会联结的情感网络；象征物以文化技能为媒介，实现了从创伤记忆到希望愿景的创造性转化。因此，当社会工作者从物的角度重新审视专业服务时，那些被忽视的植物、量表、照片与刺绣作品都能焕发出惊人的专业潜能。它们不仅是服务载体，更是撬动系统变革的支点，在自然疗愈、技术赋能、关系重构乃至意义探寻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价值。

四、社会工作的“道德—物质”实践建构

物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其在社会工作理论脉络中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或许与社会工作本身的道德属性有关。长期以来，社会工作深受人本主义影响，将服务对象视作能动的道德主体，将专业服务理解为“人—人”之间的道德实践。因此，社会工作服务主要发展出两种逻辑假设：一是在实践层面，主要强调通过专业知识和技术发展来提升服务对象的能力，而忽略了物的在场及发挥的作用；二是在理论层面，将物理解为达成服务目标的工具或载体，没有重视物承载的伦理意涵，也忽略了其能动的特质。这种逻辑定势导致社会工作陷入一种“见人不见物”的困境，难以有效发挥物在实践场域中的巨大潜力。对此，我们将重新审视作为道德实践的社会工作的优势与局限，建构一种更具伦理关怀和物质敏感性的社会工作“道德—物质”实践。

（一）社会工作的道德实践及反思

在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中，人本理念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理念强调人的主体性及其与生俱来的潜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人文主义在社会工作中的“胎记”。总体而言，人本主义社会工作主要涵盖方法

^① 古学斌、张和清、欧阳令芝：《坚守：从“映秀母亲”到“山里码头客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9—31页。

论和伦理意义两个层面内容，前者强调社会工作者在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现实层面的理解与诠释认识个人及社会问题。具体操作中要求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真诚沟通、积极接纳并具有同理心关怀。^① 后者强调人本身的价值，社会工作实践归根到底是谋求人类福祉和发展。因此，秉持人本传统的社会工作主要从服务对象自我实现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人的感情、知觉、信念、意图乃至灵性。^② 这种人本主义理念可以概括为是一种“关于人、依靠人和为了人”的社会服务观。也由此，作为密切关注人的服务和专业，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道德化”倾向，成为一种强价值介入的道德实践。这种道德实践主要包含两层意涵：一是社会工作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增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活动，其服务目的是道德性的；二是社会工作者在具体认识和界定问题、干预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都以一定的价值观为指导，其助人实践也是道德性的。^③ 总之，社会工作实务中对人的理解、问题界定以及干预模式，都蕴含着一种道德实践意味。^④

社会工作是一种道德实践不仅说明其担负着崇高的专业使命，还表明其导引并约束着从业者，要求其干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以增进服务对象的福祉为宗旨。然而，这种道德实践并非无懈可击，其在专业服务中可能存在三重困境：在认识论上，它忽视了物的能动性和伦理意涵，将重点聚焦于人际互动和社会结构，对居住环境、服务装备等物质条件对主体生活的建构作用认知不足，难以全面、系统地把握服务对象所处的复杂环境。例如，在评估独居老人的风险时，不仅要关注其社会支持网络，更要关注其住所的物理布局、家具的安全性、求助设备的可及性等，这些“物”构成了其安全感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来源。在实践效能上，工具性的物质观削弱了专业干预的可持续性。当物的要素仅被视为一种被动工具时，其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如低保金所带的尊严问题）、空间政治属性（如福利院建筑的规训功能）以及技术伦理风险（如智能设备对隐私权的侵蚀）均被排除在专业反思之外。这种简化处理使社会工作难以应对数字化技术加速迭代带来的新型伦理挑战。不仅如此，在伦理判断层面，抽象的道德话语还容易消解具体物的情境复杂性，可能将社会工作实践表达为悬浮在现实之上的道德说教，进而加剧实务界与理论界的隔阂。例如，对困难家庭的干预，若仅停留在增权赋能的口号上，而未深入分析其家庭中物的匮乏、物的分配不均或物所引发的家庭冲突，那么这种伦理判断就会显得空洞无力。因此，社会工作需要在伦理判断中充分考虑具体物的情境复杂性，将抽象的道德准则与实际的物相结合，迈向一种更具物质敏感性的“道德—物质”实践。

（二）社会工作的“道德—物质”实践探索

“道德—物质”实践试图超越传统社会工作中人与物的不对等关系，倡导一种兼具伦理关怀和物质敏感性的整合视角。这一视角强调社会工作服务并非纯粹人助人的道德行动，而是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的“人—物—场景”三元互动过程。换言之，“道德—物质”实践的提出并非是对社会工作道德实践的全然否定，而是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它保留了道德实践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核心关切，同时纳入了对物的能动性和伦理意涵的关注。这种整合扩展了社会工作的伦理边界，将道德关怀从人类主体延伸至更广阔的非人类世界。同时丰富了专业实践的内涵与方法，这也要求社会工作者不仅关注人际互动的道德维度，更要洞察人与物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具体而言，这种实践探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首先，“道德—物质”实践要求社会工作者在认知和评估层面从关注人到关注人与物的关系的转变。尽管传统社会工作也强调环境的作用，但其分析焦点往往停留在社会关系、制度结构等非物质层面，物常被视为静默的、理所当然的背景。而“道德—物质”实践则要求工作者将物的要素纳入分析视野，理解物并非人的附属，而是与人共同构成生活世界的行动者。因而拓展了社会工作的伦理视野，将伦理关怀焦点从人类中心主义延伸至更广阔的生态系统。就专业使命而言，社会工作最直接的目标是满足服务对象的紧迫性需求，恢复并提升其社会功能，而终极目标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动人类的全面发展。事实上，后者的宏大愿景已经超越了人本主义偏重个体福祉的局限，为社会工作伦理拓展至物的层面提供可能性。同时，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的严峻现实也倒逼社会工作重新审视其价值基础，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要素已成为重构社会工作

① 陈和：《人本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及其本土化过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 何雪松：《社会工作的四个传统哲理基础》，《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③ 王思斌、马凤芝：《社会工作导论》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页。

④ 古学斌：《道德的重量：论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实践》，《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生态正义纳入自身伦理框架就成为“道德—物质”实践的核心价值之一。

其次，在干预方法上，该实践倡导从对人的干预拓展为调适“人—物”关系网络。这意味着社会工作的干预目标不仅要改变人的认知和行为，更要重组和优化服务对象所处的物质关系网络，通过改变“物”来影响“人”。因此“道德—物质”实践强调社会工作者必须超越单纯的道德热情，精通对物质资源的整合运用，不断提升专业服务的效能。此外，传统人本主义道德实践容易陷入“伦理浪漫主义”误区，过度依赖价值理念的感召力而轻视物的资源发挥的基础作用。在“道德—物质”实践看来，物是社会工作干预的重要资源与媒介，社会工作者需要培养物质敏感性，学会辨识、获取并有效利用各类物质资源。例如，利用辅助设备和数字平台等工具物来提升服务效率；运用恰当的礼物或纪念品等关系物改善服务关系；借助证书或奖章等象征物传递价值理念和强化行为等。这种资源导向的方法论不仅有助于克服资源稀缺对社会工作实践的制约，还能提升社会工作干预的精准性和效果可持续性。

最后，“道德—物质”实践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一套更为系统化的行动指南。其一，社会工作者需要认识并能理解物在服务对象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能从物中解读出服务对象未曾言说的需求，突出物的情感“化人”功能。其二，社会工作者应当关注并评估物质要素与服务对象的互动关系，了解特定物如何影响并形塑服务对象的情感状态和行为模式。其三，社会工作者需要不断培养和提升“物质能力”，包括物的获取能力、物质环境的设计能力以及物质技术的应用能力等。其四，社会工作者应当保持批判反思精神，警惕过于推崇物的倾向，确保物质要素始终服务于伦理价值和服务目标。需要说明的是，“道德—物质”实践强调关注物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陷入物质决定论或物质主义，它依然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注重物的运用必须服务于伦理目标，从而避免过度强调物的重要性，而忽视服务对象的精神、情感和社会需求。因此，在具体操作中，“道德—物质”实践要求社会工作者在选择和运用物时必须追问：这一物的介入是增强了服务对象的自主性和尊严，还是在无形中施加了新的控制与标签？它所构建的是一种赋能的关系，还是一种依附的关系？这种对物之伦理意涵的持续反思，确保了社会工作的物质实践始终服务于其核心的道德使命。

综上，物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道德—物质”的整合性实践也是一种能够有效助人的新型工作范式。这种实践不仅超越了传统人本主义的视野，而且将伦理关怀从人本身拓展到非人类领域，强调人与物的复杂互动以及物本身具有的能动性，为社会工作的“物质转向”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启示。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物在社会工作服务中的角色和价值进行探索性反思，可以为社会工作的理论拓展与实务改善开启新的空间。在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与社会环境剧烈变迁的今天，重新审视物的意义不仅是社会工作理论建构和升华的需要，也是提升社会工作实务效能的需求。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三方面推进研究：首先，以社会科学的“物质转向”为主轴，系统梳理后人类主义、新唯物主义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社会工作理论的启示。同时也发现，这些理论共同挑战了传统物质观的局限性，强调了物的能动性及与人的网络关系，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其次，经由这些理论启发，进一步借助拉图尔的拟客体概念，归纳并抽象出社会工作实践中四种物的样态：自然物、工具物、关系物和象征物。这一分类不仅有助于明晰社会工作实务中繁杂各异的物质要素，也有助于厘清物在具体实践情境中如何动态转化为专业服务的效能。最后，从理论上反思社会工作缺乏对物的关注的深层缘由，并尝试提出“道德—物质”实践的概念，强调社会工作应突破“见人不见物”的传统认识，发展出具有物质敏感性的干预策略，推动社会工作从单一的“人—人”互动实践，转向更具整合性的“人—物—场景”互动模式。

本文从学理上拓展了社会工作对物的理解，并为专业实践贡献了新的理论工具。一方面，研究提出的“人—物—场景”框架，是对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经典理论范式的一次物质性的深化。传统上，“情境”常常被理解为抽象的社会系统或人际网络，而“人—物—场景”则将情境具象化为由能动的人和物共同构成的、流动的“场景”。这带来了三点理论上的推进：第一，丰富了社会工作的分析单元，将物从被动的背景提升为与人平等的分析对象，促使我们关注物如何塑造人的经验、行为和关系。第二，强化了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视角，将宏观的生态正义、环境伦理等议题，与微观的、日常的物的使用和互动联系起来，为社会工

作应对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等全球性挑战提供了理论接口。第三，推动了社会工作理论的跨学科对话，将行动者网络理论、新唯物主义等前沿思想引入社会工作，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激发新的理论生长点。

另一方面，本文对社会工作“道德—物质”实践性质的强调，对社会工作实务、教育和政策制定都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一线社会工作者而言，需要不断培养自身物的敏感性。例如在评估阶段，除了访谈和观察“人”，还应系统地评估“物”。社会工作者应不断地去反思服务对象最在意的物是什么？哪些物给他带来了困扰？物理空间如何影响其家庭互动？在介入干预阶段，社会工作者则应思考如何用物来助人，例如与服务对象共同改造其居住空间，尝试引入针对性的辅助性科技产品，或通过创造承载希望的纪念品来促进其心理康复等。对社会工作教育而言，可将“物质转向”的核心理念融入课程体系之中，在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社会工作理论等课程中增加相关内容，开设如“技术与社会工作”“生态社会工作”等选修课程。在实务教学中，可以设计基于物的案例分析和干预方案，例如，让学生为一个虚拟的残障人士家庭设计无障碍且充满尊严的家居环境等。对于机构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而言，在服务设计与资源分配中也应充分融入物质关怀的理念，注重物质援助的质量与尊严，确保援助方式能真正契合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提升其生活品质。

当然，作为一项理论探索研究，本文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仍需进一步探索物在不同社会工作领域中的具体作用，以及如何在不同社会情境中有效实施物质敏感性社会工作。此外，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虚拟物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作用也亟需深入探讨。人工智能体所带来的全新专业实践形态及其相应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持续推进。而且，社会工作也愈加需要探索能够捕捉物的能动性和复杂性的研究方法，相关研究可尝试通过“物的民族志”考察、深化人机互动研究等方式，更细腻地呈现“人—物—场景”的动态过程。不仅如此，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的发展，“人—物”的边界也日益模糊，社会工作需要积极参与相关的伦理哲学讨论，探索在“后人类”时代如何坚守专业价值，确保技术发展始终以人为本。总之，将“物”重新带回社会工作的中心，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回归与实践革新的尝试。这不仅关乎社会工作理论边界的拓展，更关乎在日益技术化和物质化的世界中，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全面、更深刻、更具整合性的关怀与支持。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研究”(22JJD840012) 的阶段性成果。王志豪为本文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朱颖)

The Return of Things: Exploring “Moral-Material” Practice in Social Work

WEI Xiaojiang, WANG Zhihao

Abstract: Social work is a profession centered on “people”, which has led to “things” being marginalized in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their inherent helping functions remaining undervalued and underexplor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things back to the center of social work by explicating their roles and value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ereby constructing a practice model that integrates both ethical care and material sensitivity. The paper advances this argument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First, it clarifi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material turn in social sciences for social work theory, emphasizing that things are not merely instrumental resources but also agential social actors. Second, drawing on the concept of quasi-objects, it categorizes thing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into natural objects, instrumental objects, relational objects, and symbolic objects, demonstrating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ird, it reflects on the roots of social work theory’s tendency to “see people but not things,” proposing that social work should transcend the singular “person-to-person” moral practice and move toward a more ethically inclusive “person-thing-context” “moral-material” practice. This approach not only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boundaries of social work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tioners with an integrative intervention framework.

Key words: material, social work, moral-material practice